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四卷第一期，2015年6月：87-93

书评

《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10。

ISBN: 978-986-02-3705-4

关启匡*
(KWAN Kai Hong)

一、书籍概要

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劳悦强教授，在2010年6月于台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文内文外”为主题的专著，即：《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此书为台大出版社“中国思想史研究丛书”第一册，是劳先生在十年之间写就的十一篇文章（劳悦强 2010：V），而皆能以“文内文外”此一汉语经典诠释的构造贯穿成书。本书内容之规模极恢宏，所涉及时代，从春秋一直到清代，几乎每一时代的中国思想史脉络皆包含其中。本书的正文有390页、〈引用书目〉28页和〈人名列表〉9页，全书共427页，可谓扎实丰富。另一方面，又将十一篇分类为“四编”，包括：（甲）通义（两篇）、（乙）文内之诠释（两篇）、（丙）文化史中的文外诠释（四篇）和（丁）思想史中的文外诠释（三篇）。

* 关启匡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电邮地址：qikuang147@hotmail.com

由于本书涉及广度的中国思想史脉络，兼及三教为议题¹，故所引书目、文献繁多，依据是书〈引用书目〉所记，列表以略示其类型与数目：

时代 种类	先秦	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宋、金	元	明	清	现代汉语世界	日本	西方	无法分类	总数
经	—	—	11	2	2	1	—	3	15	—	4	7	3	—	—	—	48
史	—	—	5	1	1	3	—	4	8	—	—	5	—	1	—	—	28
子	2	1	12	3	1	11	2	12	19	1	15	11	3	—	—	3	96
集	—	—	1	1	1	3	—	—	16	2	2	2	—	—	—	—	28
专书	—	—	—	—	—	—	—	—	—	—	—	—	24	—	14	—	38
各类论文	—	—	—	—	—	—	—	—	—	—	—	—	30	4	7	—	41
文献总数	2	1	29	7	5	18	2	19	58	3	21	25	60	5	21	3	279

由上表可略窥劳先生此书征引书目之广度与范围。以下，本文分成两部分，“文内之明”大略试论此书内容的价值与意义，而“文外之惑”则从笔者浅薄的视域出发，意图提出与劳先生此书对话的外延议题。

二、文内之明：论其作品之启发

（一）文内、文外分别之义涵

劳先生言简意赅说：“所谓‘文内’、‘文外’，其实指的是文本与文本以外的所有外缘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外缘因素中读者固然至为关键，但我们绝不可忽略产生文本的外缘因素以及读者本身的外缘因素。文内指文本本身，它独立于产生文本的外缘因素，而文外则当然包括读者本人，但同时也兼指产生文本的外缘因素以及有关读者本身的种种历史文化外缘，其中思想史的脉络尤为关键”（劳悦强 2010: V-VI）。依此，劳先生简要的指出一种介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诠释学关系。显然，他以“文”一字彰显了“文本”的主体性，故产生任何经典“文本”的历史性脉络，即是一种“文外”境域；又置身于“文本”以后的任一时代的读者，其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样是发生于此人所处的历史性脉络，故读者本身更是一种“文外”境域。劳先生认为这种文本的主体性，是以“文本”必然含有一种内在性的“意涵”（meaning），作为“文本”的本义，由此而获得其内在而存有的稳定性；反之一切非“文本”本义的任何相

¹ 按：其中，以儒家为核心的有五篇，以佛家为核心的有两篇，以道家为核心的有三篇，其中一篇涉及儒佛会通的议题。

关内容，皆是“文外”的“意义”（significance）（劳悦强 2010：XI）。作为一位中文系教授，劳先生以“文本”作为其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主体是恰当的。当然，读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分辨任一“文本”的文内、文外内涵看似简单，不过在具体的考辨实践中，“分辨”的有效性却是困难重重的。在此书中，劳先生全面地调动了“中文系”中各种各样的专业本领，包括：史学、目录学、文字学、语义学、训诂学和思想史观等等。由此可见，任何一部中文系专业的专著，都会切实的用上中文系课程所授予的种种“专门之学”。这些平时被社会大众讥讽为“无用之学”的“专门之学”，在真正的落实于一部中文专著的书写时，才真正的显露出其“大用”的面貌，劳先生此作便是一实例。

（二）书中四编之大略

承上所述，劳先生着意于“文本”的主体性，而有文内、文外之辨。但，在处理具体的经典个案时，却隐含著更复杂的理论构造，故劳先生将十一篇论文，归纳成四编的规模。

第一编即“甲、通义”，劳先生自述〈第一章 导论〉的目的是：“讨论文内文外两种诠释取向在先秦时期形成的大致情况”；而〈第二章“朋”字的一个思想史考察——以《论语》注释为例〉则“要比较全面认识诠释的性质和面貌，……，同时又要明了思想史对诠释的可能空间可以产生的启发和制约作用”（劳悦强 2010：VII）。在〈第一章〉，劳先生在论及传统经传的类别时，指出了“内传”与“外传”在诠释内涵上的根本区别：“尤有进者，所谓‘传’，汉儒再细分为‘内传’与‘外传’两种；‘内传’与‘外传’之别则在于《诗》文本‘本义’与‘非其本义’之分际。换言之，‘内传’乃文内诠释的著作而‘外传’则为文外诠释的文字”（劳悦强 2010：36-37）。劳先生此一清晰的分判，值得我们注意。至于〈第二章〉关于《论语》中“朋”之义理内涵，则是劳先生多年来关注的焦点。²〈第二章〉可算是一篇由一“小题”而“大作”之的典型之作，劳先生全篇扣紧《论语》首章，牵此一发而动儒学思想史之全身，功力固深矣。此章，通过观照历代注解对《论语》首章的诠释，而得以：“探讨哲理追求本身和启发整个思索动机以及影响思考方式乃至思考结果的历史文化因素，两者之间的孪生关系”以及此一结构所带来的诠释局限（劳悦强 2010：77）。

第二编即“文内之诠释”亦有两篇。〈第三章 以明乎？已明乎？——释《庄子》的“明”义〉，以《庄子》中“明”的本义，作为“文内”探讨之对象。在此章中，劳先生辨清《庄子》之“以明”，并非诸子一般所追求的外显之高明；《庄子》正是反对外显之高明，而要归反于个体内在之冥，故“以明”者非是人所显之明（即郭象所谓“人耀”），而是存有根源性的天之明（即天钧、天光）（劳悦强 2010：102-108）。

² 劳先生在其一本较通俗的著作《论语心》中，便有〈说朋〉、〈无友不如己者〉的相关阐发，敬请参考（劳悦强 2006：128-142）。又，据笔者所知，劳先生在台湾诸所大学，均曾以此一论题，发表过学术演讲。

〈第四章 本义的追求——朱熹论《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劳悦强 2010: 76-92），以寻绎《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的本义。从此章之探讨，可以同时看到辨明古典文献之“文内”、“文外”脉络的重要性。劳先生对于此议题的关注，发源于中、西学界普遍的现、当代诠释，皆采取“性别诠释”的路径，而将此章视为孔子有性别歧视的铁证，对此劳先生欲拨乱反正。通过此章的研究，得以彰显出忽视“文内”的探讨，而大张意识形态化的“文外”诠释，是诠释任何经典文献的大忌。

第三编即“文化史中的文外诠释”共有四篇。此编与第二编不同的是，并未锁定任何一个经典章句或概念以作为考察之核心，而是在个别文化史脉络中，于各种相关的文献之间，映照出一个又一个经典诠释的脉络。〈第五章 借题发挥——从《注维摩诘经》看中古佛教讲经〉，据劳先生所述，鸠摩罗什的《注维摩诘经》在此之前，并无受到学界重视（劳悦强 2010: 154），此文可说是此议题的先驱，极具创发性。

〈第六章 说经注我——从无名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看道教讲经〉，与〈第五章〉一样，无论是此章的无名氏又或前一章的鸠摩罗什对于道教、佛经的注解，都有其当时宣教的现实需求。劳先生在〈第五章〉、〈第六章〉中，带领我们从经注的文本世界，回到了唐、元二代，佛、道宣教的文化世界。“宣教”是一种真实、具体的生活情境，是一种中国古代公共性的传播场域。在此一公共传播的场域中，佛、道的大师皆必须出入于圣、凡之间，将高深的神圣教诲，通过生活性甚至娱乐性的转化，以启发广大的“愚夫愚妇”；一旦达至开悟的目的，则由俗转圣，故俗谛、圣谛实可通也。〈第七章 儒门公案——藕益智旭的《论语点睛》〉，文中劳先生立排一般将《论语点睛》视为“援佛入儒”的见解，极力印证藕益大师“三教归一”的远大理想。劳先生指出，藕益大师所追求的“第一义谛”，并非狭义的专指佛门教义（劳悦强 2010: 218-219），而是人生中的“真谛”本身，此一“真谛”是通贯三教的。故藕益大师能识得《论语》的“文字血脉”，识得“好学是孔子真面目”等儒门要义。在此章中，可见劳先生贯彻其摒除“前见”干扰的研究精神，他在较为通俗的《论语心》〈自序——兼论《论语》的读法〉（劳悦强 2006: 9-25）中，亦传授人摒除前见、私见的读经理念。我们都知道，人作为一种意识主体，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前见、私见，正因为前见、私见的普遍必然，读书或做研究更应该刻意排除之，以此摒除之功夫，才能识得真相。〈第八章 攻乎异端——刘宝楠父子对朱熹的爱恨情结〉，劳先生亦一反汉学家之藩篱，指出朱熹的《论语正义》并非如清代汉学家所斥那般；反之，朱注相当重视字义的训诂（劳悦强 2010: 268-270）。刘宝楠父子碍于“汉学”视域的局限，有意无意的暗引朱注的成果，并且大力贬抑朱注中所弥漫的道学气息，在劳先生看来实是不必要的。劳先生此篇亦启发我们必须正视“朱学”在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典范地位，以刘氏父子渊博之学识，尚无法逃出其掌心，即可知也。

第四编即“思想史中的文外诠释”共有三篇，其中〈第九章 何晏、王弼“道不可体”说的思想史背景〉是一篇论证细腻的观念史研究。〈第十章《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与本书的〈第四章〉实为内、外呼应之作，在劳先生辛劳经营下，后人对于《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的研究已难出新论。〈第十一章 温故知新——孔子之川流不舍与朱熹之川流不息〉，劳先生之论一改倡导朱学的口吻，通过

检讨程朱对于“子在川上”过于道学化的诠释，而体现了其依法不依人的理性精神。劳先生并没有深责程朱之意，他以朱子一贯主张的谨慎读经来检视朱子本身（劳悦强 2010：387-389）；发现朱子为学虽谨慎，但其道学本怀作为一种“文外”的力量，却远大于“文内”诠释的诉求，故难免于“高看”了《论语》中某些平实的情境。

（三）浅述此书之学术意义

笔者就全书的撰作基调观之，劳先生追求详尽、全面而清晰的论述，虽然其内容多有细密、艰涩之内涵，但稍有经过基础学术训练者，相信皆能一读即明了其文句本义。当然，欲把握劳先生书中所彰显的学术视域，并非易事。无可否认，笔者阅读此书之时，常有略感吃力之处，未能领略之处亦多有所在。表面看来，劳先生文内、文外之辨，似乎有重“文本”主体性、偏重“文内”的本义诠释之意味。读完全书后，再三思之，其实不然。在劳先生此书中，文内、文外之辨，实展现了一种具有诠释学意义的分析方法，其文之内、外之辨，仅想要还原“文本的本义”与“文本的衍义”而已；无论本义亦或衍义，皆是烘托出一个文本、其作者和其历史脉络之全部的资具。惟，当衍生的意义扭曲了“文本的本义”时，就会使后学见不得经典的本来面目，故需要通过当代学术文内、文外之考辨工夫，归复其本貌。依劳先生此书所示，“文外”的界域更是探讨的难点，这需要通过历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深厚脉络，还有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的专门知识，才能铺陈清楚。劳先生这种彻上彻下的学术史功力，确实并非一般的学术入门者所能比较的，故笔者亦仅能窥于其门墙之外，唯具有与其相当功力的学人，方足以议论其长短。

另一方面，此书亦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就是朱子的读书法（劳悦强 2010：70-71、143-146、232-233、251）。若笔者不错，劳先生主要是心仪于朱子认真、谨慎的读书法与注解模式。朱子主张的读书法，强调不能错过一字，且须字字玩味，不能胡乱掠过任何“虚词”，强调最好一天只读一、两章的慢读法。虽然如此，程朱的儒家诠释，却有弊于道学气息过强的局限，往往只能言孔子的圣人气象，而压抑了孔子亦有平淡面貌的可能。故，笔者以为读者执于是书〈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之两端，便可窥得朱子读书法之好处，而得以免于其弊端。

语言是思想存在的载体。既此，就算有高深的思想，倘若缺乏有效且细腻的语言体系，终究不能将其语义完全表述清楚。这种语言、概念不够用的话语困境，很可能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思想作品中，致使那些一流的头脑，其深刻的才智或埋没于其著作中的各个角落，等待后人重新诠释与发掘（岑溢成，1993）。³在当代新式的汉语学术规范下，劳先生此书表现了卓越的驾驭能力，通过学术论文的体例与精确的中文语义，分析文内、文外各种思想脉络。是书所示的深切解读能力，加上有效而细致的书写，使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思想史更真实，却常被忽视的学术视域。同时，不断逼迫读者重新考虑，每一种熟悉又或陌生的古籍材料的思想史义涵。

³ 按：此种说法是笔者从台湾中央大学岑溢成教授所开授的“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一课中听闻而得。岑先生以自己的文章〈王弼之“名”、“称”之辩与邓纳伦之名称的两种使用〉之心得，指出像王弼这么出众的头脑，倘若经过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洗礼，会有更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以表述其高明与深刻的哲学语义。

文中的用典有左右逢源的能耐，其渊博的识见，令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这样广阔的文献视域中，其于思想史脉络中的推展，对于各种观念、字义的内涵指涉具有高度而细密的分析能力。

劳先生给予我们如此的启示：一位成熟而稳健的研究者，其作品的内涵，绝非将所知的一切都倾盆而出；反之，论述的节约与其文理恰到好处的安排，才是呈现、解决问题的关键。由此，作者的博学并不是用来炫耀的，更应该用以展开、裁成一个深刻的问题，通过各个材料之间隐微的线索之展示，以清晰的现代汉语，重新缝合、推衍出一个又一个中国思想史的纵深度，才是切要的。

这种自觉，表现在是书对于刘宝楠父子《论语正义》一书批评的同时，亦触及到了清代出版文化的可能议题，他在此章第104注，说：“清代学术的专业化跟晚明以来印刷业的发达，以及科学竞争日益剧烈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不过，这些学术史以外的考虑均逸出本文范围，在此不予讨论”（劳悦强 2010：280）。显然，此处劳先生蜻蜓点水，即是顾及全文“问题意识”的主轴，一切无益于问题开展与讨论的内容，皆点到就收。这就是其丰富但不失节制的撰文实例，值得后学借鉴。

三、文外之惑：论其观点之延伸

（一）孔子的身世能否成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文外”诠释的一种反证？

在是书〈第四章〉和〈第十章〉两篇鸿文的启示下，笔者同意劳先生于此的文内、文外之辨，同时亦迫使笔者联想到一个可能的“文外”脉络。我们知道，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并非叔梁纥的正室，而是在孔氏原配夫人产了九女与妾产了一跛子的前提下，再迎娶的小妾。由于老夫少妻之配，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亦有“野合”之疑（西汉·司马迁撰、泂川资言考证 X：3243-3245）。司马贞据《孔子家语》，以为孔子三岁丧父（西汉·司马迁撰、泂川资言考证 X：3246），孔家本为贵族后裔，家道中落，孔母颜征在于孔家地位卑微。寡母带大的孔子，其成长的艰难可想而知，在十七岁左右，其母不幸早逝，孔子将其母与父合葬于防⁴，可见其尽孝之至。从孔子少孤，而与寡母相依为命的成长历程看来⁵，确可作为孔子不会无端歧视女性的外缘反证。在中国历代的传统中，男性虽长时间的居于主导的权力核心，却未必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与母亲的历史形象难道毫无关系？笔者以为，在考察孔子是否可能歧视女性这个议题，亦可以将之放入一个更大的“文外”之域中，即中国传统的母性形象史来加以研讨。

（二）“文外”的一种潜在的焦虑——“儒门淡薄”的思想史脉络与当代反思

读毕《文内文外》全书，在劳先生“三教互动”的中国思想史视域中，亦迫使读者联想到其中所具有的一个潜在议题。于是书第207页，当劳先生在探讨无名氏

⁴ 西汉·司马迁撰、泂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3247。

⁵ 按：笔者在师大国文研究所，曾在林初乾教授“《资治通鉴》研讨”的课上，听说中国历代伟大而坚守忠信礼教者，大都有“寡母带大”的少小经验，此一历史现象或可留意。



的《清静经注》的同时，亦点出了北宋乃至明代“儒门淡薄”的困境（劳悦强 2010：207-208），实则“儒门淡薄”亦是历代儒者，乃至当代儒学研究者的共同的乡愁。另外，劳先生早在〈第三章〉已提醒我们：“早期的儒家文献揭示，人伦秩序与礼仪规范是儒家思想中的两个重要基石。儒家一方面强调人与人之间因身分和等序而产生的种种人伦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礼仪是规范各种人伦关系而使之有序的重要手段”（劳悦强 2010：83）。在劳先生诠释“明”的另一面，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性与在上位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就算孟子将儒者身份调整为“劳心者”，相对于百姓的“劳力者”，必要时亦与君王分庭抗礼。但，在中国传统中，儒者从来没有抛弃过作为权力分享者的“候选人”这一身份。故儒学的论述，其道德性是内置的，托之于言，则必然只能是正面、光明面的论述。当我们通过是书〈第五章〉、〈第六章〉，便可窥见佛、道民间化和通俗化的具体实践。相形之下，儒门何以能不淡薄就成为了潜藏于读者心中的谜？尤其，回到当代之视域，儒家需要经历一种怎样的转化呢？百家讲坛式的于丹教授，其所说的孔、孟虽精义不足，但传播力十足，我们要如何接受呢？这确是一个由劳先生此书所能映照出“文外”之感，有待大家共同思索。

四、小结

诚然，本文是一篇不完整的书评，作为一篇合格的书评，理应对所评之书，提出合理之批判。惟，笔者谨述劳先生是书之好处，实有一“文外”之缘由。从身份言之，劳先生是国际学界的资深教授，而笔者仅是一名研究生。故在筹划写这篇书评之时，笔者谨记得要从是书中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处在一个学习的情境中，自然无暇顾及及其他。

实则，当我们退去吹毛求疵的看官心态，用虚心来迎接《文内文外》这部书，确实能读到劳悦强先生撰作的用心。劳先生作此书，实带着“愿以金针度予人”的心情。劳先生解读经典的方法，从其评述朱熹的读书法，可窥得一、二，循着此路上溯于朱子，当有一读书进德的门径。这道门径随时为你、我而开，仅等着我们叩门求道，难道不是吗？

参考文献

- 西汉·司马迁撰、日本·泷川资言考证，1989，《史记会注考证》，台北：天工书局。
- 钱穆，2003，《孔子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 劳悦强，2006，《论语心》，香港：阿汤图书。
- 劳悦强，2010，《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 岑溢成，1993，〈王弼之“名”、“称”之辩与邓纳伦之名称的两种使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国际东西哲学比较研讨会主编，《东西哲学比较会议论文集第二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